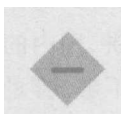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62年1月，时任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政府代县长的刘新起和县委书记宋务迪一起，去北京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。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，全国一片饥馑，为了解决人民生产、生活及思想上的混乱，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。参加这次会议的晋东南地区的代表总共36人，由地委书记赵军、专员张行夫带队。

山西省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在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、省长卫恒率领下乘火车到了北京，住进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（好象整个华北局的同志都是在那儿住下的）。



1月11日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，参加会议的总计7118人，有中央、省、地、县、国家重要厂矿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。当毛主席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林彪、邓小平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，全场掌声如雷。

那时候正是困难时期，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，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对党、对毛主席的信任。会议由毛主席主持，那年他69岁了。刘新起这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。毛主席说这次扩大会一个县来两个人，地委来3个人，省委来4个人，中央局也来4、5个人，要把这会当做一次小整风。又说这次会议中央给大家准备了好、中、差三种饭，现在国家困难，许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，让大家吃好饭对不起全国人民。而同志们在下边工作又很辛苦，吃差饭中央又觉得对不住大家，我看就吃中等餐吧！毛主席诙谐的话把好多人都逗笑了。（那时保

密制度甚严，刘新起等出发来北京时，心情很紧张，不知道此行到底是去干甚。直到毛主席讲了这番话，大家才豁然开朗。）

毛主席讲罢后，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。这个报告当场就发到了与会者的手中（其他领导的报告则是会后才发）。报告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，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。刘少奇指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一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，基本建设战线过长，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；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，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，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；三是在全国不适当地建立了许多工业体系，权力下放过多，分散主义严重；四是对农业增产估计过高，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，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。

刘少奇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，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欠收外，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建设工作的经验不足，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，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，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发现问题、纠正错误。刘少奇还提出了十项要求，主要是国家计划（包括生产、基本建设、物资、劳动、财政、信贷、国内贸易和进出口等方面）必须保证全面完成，不经中央批准，不得擅自变动；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都必须纳入计划，按规定审批程序办事；凡产品属全国统一调配的重点工业企业，直属中央管理，已下放地方的，在1962年内逐步收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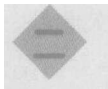
刘少奇还说1962年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至关重要的一年，必须抓紧这一年的工作。刘讲罢后，毛主席

提议对刘的报告稿作评论,提意见,大家有甚说甚,说错了也不怕。

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,而是直接提交会议讨论。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提意见,广泛吸收群众的智慧。经过讨论、修改,最后才形成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,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。

刘新起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共开了6次(或者7次)全体会议,一般都是下午开会,上午在住地讨论。每次开会前毛主席都说:“同志们,现在开会。”开罢了他又说:“休会。”原定每天是8个小时,毛主席说这样太辛苦,就改成6个小时,最后几天干脆是3个小时。主席台上除了林彪不抽烟外,毛主席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陈云都抽烟,周恩来有时也抽上一支。而台下没有一个抽的,都在低着头记笔记。

大会对同志们安排得很周到。吃饭是8个人一桌,早上有蒸馍、大米饭、米汤,中午、晚上都是8个菜,主食是大米饭、面条(那时餐桌上还不兴放酒水)。礼拜天照常过,大家洗洗涮涮,看场电影听台戏,还请来侯宝林说相声段子。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,都有大轿车接送。考虑到有些同志视力差,看不清台上的领袖,大会就从20排后,给每个位子上放一个望远镜。桌子上还并排放着好几个电钮,西藏、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同志听不懂中央领导的讲话时,插上耳机子,一按电钮,同声传译过来的就是本民族的声音。而那时的条件真叫简陋,住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,二人一个房间,刘新起和宋务迪住在一起,就是每人一张床一条被子,连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买,笔记本、钢笔自己带。国家就是发了一张“出席证”。



这次会上民主气氛很浓厚,中央领导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。1月27日下午,刘少奇作口头报告(1月11日刘少奇的报告称为“书面报告”,1月27日的报告,是对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做说明、发挥、补充以及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解释,这个报告史称“口头报告”)。针对党内看法不一的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这“三面红旗”,刘少奇说我们现在不取消,要继续为“三面红旗”而奋斗。他说有些问题现在看不清楚,要经过5年、10年以后再作结论。

实际上那时他就对“三面红旗”有怀疑。关于对成

绩和缺点的估计,刘少奇说:“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、错误和成绩,比之于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,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套。……有些地区,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。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3个指头,成绩还有7个指头,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,是不能说服人的。”拿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,来比喻成绩和错误,这是毛主席第一个提出来的。而这次会上刘突破了毛的说法,把一些地方经济困难的原因,说成是“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”。

刘少奇严厉批评了《人民日报》。《人民日报》在1958年的7、8、9月连续发表社论,批判“条件论”,宣传“没有万斤的思想,就没有万斤的收获”、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等唯心主义。1958年9月18日《人民日报》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收成,亩产量竟高达13万多斤。刘少奇还提到了彭德怀,说“庐山会议”上,彭写给毛主席的信,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。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中央的主席写信,即使信中有些意见不对,也不算是犯错误。刘讲这番话是需要胆略和勇气的,因为这时候对彭德怀仍不予以平反,怀疑他有一个“反党集团”,还有“国际背景”。并且刘少奇说这话的时候,毛主席就坐在他的旁边。刘还说如果不讲民主,仅仅提倡“不怕开除党籍,不怕丢官,不怕坐牢,不怕离婚,不怕杀头”的犯颜直谏,除了历史上多几个烈士,是不会有其他作用的。刘少奇忧心忡忡地说:“实事求是地讲,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,表现在吃的不够,穿的不够,用的也不那么够。”

1月30日下午,毛主席讲话。毛坦诚地说:“拿我来说,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。工业、商业,我就不大懂。别人比我懂,少奇同志比我懂,恩来同志比我懂,小平同志比我懂。陈云同志,特别是他,懂得较多。对于农业,我懂得一点。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,还是懂得不多。”并且明确表态:“凡是中央犯的错误,直接的归我负责,间接的我也有份,因为我是中央主席。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,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,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。”毛主席浓重的湖南口音很不好懂,他边讲话还边大口地吸烟,并不时地咳嗽几声,但他的赤诚感染着每一个人。毛主席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带头自我批评,同时有些对毛的指名批评,在建国后的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的。

2月6日下午,邓小平讲话,讲的是党的建设问题。



毛泽东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讲话

小平讲话很吸引人,举的例子也生动。他说:“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,伙夫同志一起床,他不问今天锅里有没有米煮,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。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。这说明我们军队里的战士都是关心战略。”还说:“我们最近收到一些匿名信,其中说的都是很好的意见。为什么要匿名信?既然是共产党员,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地郑重地发表自己的意见,由半勇敢变为全勇敢呢?”

邓小平讲话时,毛主席就坐在他的右侧,毛主席和刘少奇不时地插话。当邓讲到不准搞派别活动时,毛主席说:“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。有一部分人,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,是不是许可呢?”邓答:“这是党章上许可的。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,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。”当邓小平谈到把一些领导人同伙夫、勤杂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里,起不到多少监督作用,建议把领导人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,或者放到书记处去,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时,刘少奇说:“可以有这么个建议,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。”邓小平说:“不一定一个月,3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。”小平这话毛主席赞同,

说:“检查工作,总结经验,交换意见。”

邓小平最后说:“刘少奇同志讲到力争上游,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。我们要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,力争上游!我们要在加强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,力争上游!我们要在学会当好‘班长’,学会当乐队指挥,学会‘弹钢琴’方面,力争上游!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为下一代树立良好榜样方面,力争上游!我的话完了。”

同志们热烈鼓掌。邓小平讲罢后,朱德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。2月7日大会闭幕时周恩来讲,周恩来分析了目前国家存在的困难,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。并代表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,说:“对几年来的缺点、错误,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,各综合口和各部,要负很大责任。”

出奇的是1月29日下午林彪的讲话,他与众不同,说现在的困难,“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。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,如都听毛主席的话,那么困难会小得多,弯路也会变得少一些”。“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,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。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,受到干扰时,就会出毛病。几十年的历史,就是这个历史”。他在会上大肆吹捧毛主席,说:“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,不是一方面的。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,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。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,总是八九不离十的”。林彪还大骂彭德怀,说他走的是一条“反动军事路线”,是“大军阀”、“大党阀”、“从来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”。林彪讲这番话时,毛主席插话更多。林彪当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,他边讲话边挥动手臂,一口纯正的湖北黄冈口音也好听,所以煽动性极强。刘少奇的报告作了不到3个小时,林彪一口气就讲了4个多小时。

散会后天大黑,北京的街头已经着了路灯。林彪讲罢后,毛主席夸他讲得好,说“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,关于党的路线,关于党的军事方针。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。”不仅毛主席,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也都认为林彪说得对。毛主席让林彪用3天的时间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,林彪说:“3天不行,5天吧!”毛主席答:“好,就5天。”



按照日程安排,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月

30日就要结束。1月30日是腊月二十五,代表们都预订好了车票,只等一散会,就赶回家去过春节。29日下午,林彪讲罢后,毛主席即席发言。毛说:“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,这是个矛盾。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,是恩来同志、小平同志、朱德同志,我也想讲几句话。”同志们听了都拍掌欢迎。就在这时候,从底下传到主席台上一张小纸条,毛看了就笑了。刘新起后来才知道,这是东北局的一位老同志写的,署名“党小鬼”。他说明天会议就要结束了,可大家还有很多话没说完,还憋着气,要求把气出完再走。

毛主席当场同意,宣布延长会期,让大家出气。他说:“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?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?我看,春节不关大局,不关什么农、工、商、学、兵、政、党。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,有什么不好啊?”同志们听了群情振奋,全场热烈鼓掌。毛又说:“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。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,晚上看戏,两干一稀,大家满意。我建议让人家出气。不出气,统一不起来。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,回到地方上就更不敢讲话了。有什么气出什么气,有多少气出多少气,不管是正确之气、错误之气,不挂账,不打击,不报复。”毛主席还风趣地说:“如果你们不赞成,一定要明天结束,我也可以接受,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。”

在毛主席的倡导下,会期延长一周。接下来就有两件事情要办,一是过年,一是“出气”。

从1月31日到2月7日,以中央局为单位召开会议。主要是地方上来的同志给中央、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提意见,开“出气”大会。当时全国有华北局、西北局、中南局等6个中央局。华北局的“出气”会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,中央派一名记录员到场。会议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,李雪峰中等个子,胖胖的。他首先讲了这次提意见的重要性,接着副书记李立三发动大家提意见。李立三历史上犯过“左”倾冒险主义错误,那时候他才60多岁,但看去却很苍老。华北是革命根据地,是老解放区,同志们都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,现在要站起来给党提意见,都觉得抹不下脸来。

这时候薄一波来了,薄那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。他是山西定襄人,同志们见了他格外亲。薄一波见的世面多了,口才又好。他说前些时到南方一个地方去,那里的同志很热情地招待,吃

的、住的都好。可看了几天下来,觉得那里存在不少问题。说出来怕伤了和气,不说吧问题又确实很严重。“我是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?”薄一波问大家。那还用说,“说吧!”大家异口同声。“那好。”薄一波提高了嗓门:“这道理一样。现在我们党的工作有了问题,你们都是在下面了解实际情况的人,也应该都说出来。”

这下大家思想通了,都争先恐后提起意见来。有的说浮夸风、共产风刮得太厉害;有的说省委领导工作作风粗暴,“老八路作风”不见了;还有的说“一平二调”损害了先进社队的利益,不能再搞下去了。“一平”就是搞平均主义,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,平均分配。“二调”就是县、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(包括社员个人)的财物和劳动力。这种做法在1958年以后的公社化初期极为盛行。刘新起提的是政策变得太快,一会儿一个政策。那时在基层干部中流行一句话——“电话赶不上变化”,刚发布下来的命令正在贯彻落实,忽然上级一个电话打过来又变了。那几年晋东南地委隐瞒库存粮食数字,多征收了各县区的公粮。这件事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上被抖出来,各县、区长纷纷提意见,弄得地委领导很是难堪,地委书记赵军在会上做了检讨。还有的领导一次检查通不过就再二、再三地做,哪天通过了哪天算。对市委领导、省委领导,甚至对毛主席,有什么意见也能提。

2月4日这天是除夕,同志们早早就打扫了房间,穿上了新点的衣服,准备和毛主席一块吃年夜饭。这时候中央认为七千多人在一起吃顿饭,光搬动桌、椅、碗、筷、碟就需要很多人力、物力,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于是决定在各住地,由中央局领导和大家一起过春节。华北局的全体同志是在招待所的大餐厅里欢度除夕的,李雪峰代表毛主席给大家敬酒,祝同志们新春愉快、身体健康,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。那天晚上喝的是“西风”酒,每个桌子上只上一瓶,每人喝上两盅就是了。刘新起记得在北京开了20多天会,只上过这一次酒。没有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顿饭,大家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。但晚上毛主席要和同志们一起观看春节晚会,于是大家又高高兴兴去了人民大会堂。刘新起记得那天晚上看的是京剧。

大年初一放假一天,毛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及首都4万多军民共度春节。毛主席、刘少奇走上主席台,向大家

祝贺,全场欢呼“毛主席万岁”。团拜会结束后,大家都去街上游玩。节日的北京红旗飘扬,张灯结彩,爆竹声声。晋东南地区的36位同志来到颐和园摄了张像,做为这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留念。

在这次会上,毛主席说过一句传诵至今的名言——“白天出气,晚上看戏,两千一稀,大家满意”。两千一稀就是一天能吃上两顿干饭和一顿稀饭。那时候粮食供应紧张,一个县委书记家吃一顿猪肉臊子拉面尚困难,与会者一天能有两顿干饭吃就蛮可以了。吃饱了饭,在会上又出透了气,还在北京过好了年,同志们的心情都很舒畅。都说再干不好工作,就真对不起毛主席了。



2月7日(大年初三)是大会的最后一天,这天周恩来讲话。周讲的是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及克服困难的办法。周总理阴沉着脸,说我们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、会拍马、会吹牛的“风马牛干部”(刮风就是指浮夸风、共产风、命令风、干部特殊风、生产瞎指挥风等“五风”)。还说“党政机关和企业、事业单位,首先要裁并机构,要‘拆庙子’,同时要‘搬菩萨’”。总理讲罢后,又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,接着毛主席讲话。

毛主席高屋建瓴,谈笑风生。他说把同志们请到北京来住了几天,都讲了讲心里话。中央少奇同志、恩来同志、朱德同志、林彪同志、小平同志和我也讲了讲,就是陈云同志没讲。陈云同志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,他还没调查透。这时候毛主席又扭过头来问坐在旁边的陈云讲不讲,陈云说不讲。毛主席说好,等他调查充分了再讲吧!这次会上毛主席有好几次请陈云讲话,陈云都没讲。毛主席安排同志们回去以后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落实好,接着就宣布大会闭幕。

散会后,中央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合影留念。刘新起记得好像是在外交部照的相。那时候技术落后,不可能照一张七、

八千人的全体相,就以中央局为单位照。首长们先在那坐好,大家按事先排好的顺序进去站好。这时候毛主席就站起来问同志们好。规定不能主动和毛主席握手,主席伸出手来你才能握,主席问话你才能答,所以一会儿功夫就照好了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和大家的合影,中央给全国每个县委、县政府各赠送一张,私人谁想要出16块钱。那时正经济困难,大部分人没要这张相,刘新起也没要。今年80岁的刘新起提起这事来仍后悔不迭。

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共开了28天。鉴于当时国内外特殊的政治形势,《人民日报》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均没有对这次会议做报道,一般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还开着这么个会。大会规定,与会者不准给家里写信、打电话。所以20多天没有音讯,有人还以为他们是有问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。刘新起记得晋中地区有位同志给家里寄了封信,被组织上知道了,不但把信追回,还让他在会上做了检查。“七千人大会”在当时也没有这种叫法,后来才有了这个名词。

正月初五从北京回来,宋务迪、刘新起连家也没回,就召集全县党员开会,传达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。接着又召开社员大会,把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声音传到每家每户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,“七千人大会”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。它对于统一全党、全国人民的思想,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,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